

中非价值观对比：两种和谐理念

塔迪斯·梅茨 【南非】

约翰内斯堡大学特聘教授

一 班图精神和儒家传统思想中“和谐”一词的含义比较

从相似点而言，两种传统都将“和谐”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两种传统都认为和平是和谐关系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他们也否认和平共处会破坏和谐，这两者都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具整体性的东西。

具体来说，在两种传统中，和谐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相同观点或相同生活方式。儒家思想更是重点强调了此点，并经常引用《论语》中的名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对中国传统中的和谐进行了多年研究后，李晨阳教授指出：“和谐是通过创造性张力中的不同元素相互作用产生的能量来维系的。”从非洲的价值观来看，和谐关系指的是一种友谊或友爱，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但并非一定要求同；事实上，成为朋友或相互关爱，就是帮助对方找到其不同于他人之处或独特之处。

此外，对于两种传统而言，和谐关系包括互惠、互助和帮助参与者提高生活品质的行为。虽然和谐是一种关系性的善，而不是对个人固有属性的还原，但它仍然是一种条件，它包含了个人作为其一部分而生活得更好的期待。

最后，儒家与班图精神之间的主要相似点还在于二者均认可“家庭第一”、“仁爱始于家”等相关箴言。虽然两者都认为所有人类都应达到一种道德精神境界，但家庭成员在分配个人财力和其他资源方面原则上具有道德优先权。

除了这些相似性外，儒家世界观中的和谐与班图精神中的有所不同。首先，虽然“儒家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并未排除内在的和谐”——这点与非洲道德准则不同，后者更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非洲人看来，与他人分享同一种生活方式、关心他人的生活品质绝对是一种关心他人的做法，至少在哲学意义上确系如此，而儒家的和谐观则强调自我，比如个人的精神状态达到西方人所说的“有机统一”的境界。

其次，非洲人对和谐的理解以友好关系为基点，而“儒家则认为和谐（而不一定是友谊）源自于相反作用力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举个例子，撒哈拉以南地区希望人们能够创建一种团结一致的生活氛围，也就是说，将彼此称为“我们”，以对方的荣誉为荣。这显然不是中国和谐的必要条件，如果两个有对立态度的政党被适当地组织起来，也可以培养出和谐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创造性的东西，对双方都有利。

最后，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和谐关系的定义偏向于在做决定时的平等主义，而中国则并非如此。事实上，撒哈拉以南的传统社会以酋长和长者为统治阶层，其他人应向他们表示尊重，并且在家庭生活中，父权占统治地位。即便如此，在做决定时，酋长会尊重经大家选举产生的长者或所有牵涉到的成年人的一致决定。此外，在非洲传统中，人类尊严的观念较为显著，在这种传统中，和谐关系包括以寻求合作或咨询的方式尊重他人。相比之下，尊严，至少是将人权纳入政治参与的一种思想，并不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特征。儒家思想和更普遍的中国思想的特点是，相信“等级体系的自然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人都是不平等的，这点不言而喻。这种观点也常常体现在治理和社会地位（而不是财富分配）中。

二 传统非洲与中国和谐观点的当代表现

我认为非洲和中国的和谐价值观可以继续影响当代生活的三个主要方面，特别是政治、经济和社会。

1. 政治

在广泛的层面上，非洲和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家称之为“完美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政府的重点应该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培养他们作为道德存在的自我实现。尽管许多西方人，或至少是西方传统理论家认为，国家

应该仅仅强化人们的个人权利，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而旧时的人们则认为国家应该服务于国王的利益或思想，这两种观点在班图精神和儒家世界观中都没有体现。相反，后者强调了国家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其公民过上客观上符合他们需要的生活。这意味着不仅要满足公民的生物需求，使他们成为富裕人士，还要促进他们的良好道德或卓越的人际关系。

完美主义是道德体系的一个明确含义，认为和谐是一种中心价值。对于班图精神而言，请大家回想一下，珍视和谐包括表现出团结一致，即以预期会提高他人生活质量和利益的方式行事。同样，对于儒家来说，抽象的和谐就是通过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式缩小差异，往往与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适用于政治，体现为统治者为提高下属生活而采取的所有行为。

虽然对于和谐的共同关注导致完美主义在非洲和中国的思想和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于政府而言，差异性的和谐概念可能会对谁应该控制的观点产生争议。在流行语中，班图精神中的和谐规定双方民主，而儒家的和谐则倾向于“任人唯贤”。

如上所述，许多非洲人普遍认为，对和谐关系的重视是分享生活方式和关心他人生活质量，倾向于支持殖民前撒哈拉以南社会以预先决定为中心、以共识为导向的做法。事实上，非洲大多数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常常强调和谐的价值，他们建议应为当代国家提供一种更加丰富的民主政体，而不是多党竞争制度，即议员们就如何造福百姓而寻求一致意见。

虽然当时的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时代没有采取这种共识，但这种趋势显然已经走向了某种民主。撒哈拉以南地区签署了著名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或《班珠尔宪章》。该宪章将人的尊严置于非洲价值的核心地位，并承诺政府支持将在日常实践中坚持一系列个人权利，其中许多涉及言论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除了《班珠尔宪章》，包括“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自由参与政府的权利”，非洲联盟成员还受其《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的约束，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过去30多年来已经开始施行多党选举制度。

与中国形成的对比显而易见。儒家关于和谐作为多样性中互利合一的概念，以及作为等级关系所促进和实现的内容，可能导致中国人民接受这种缺乏民主制度的事实，不仅在过去，也在当下。儒家常常被认为淡化“血统贵族”并坚持“高尚的德行”。

有人认为班图精神和儒家和谐观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催生不同的政治权力体系和关注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建立在与现代西方政治力量截然不同的非竞争性和非多数主义决策模式之上。在传统的非洲，要求达到一致同意，而在中国传统意义中，最具资格的人员所制定的规则即为最好的。

2. 经济

社会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特质放在“儒家动力论”（《中国文化连接》，1987）或“长期定位”的标题下，并强调他们的“前瞻性”维度。也就是说，训练、勤奋、毅力、节俭和节约意味着愿意放缓追求满足的步伐，放弃闲暇时间，并为了未来更大的收益而在传统面前调整。通过“长期定位”，这些理论家们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或整个社会为了子孙后代果断采取行动，但是建议中国人应对和谐以及家人的福祉，包括他的后代保持基本关心。考虑到迄今为止我所提到的孝道、和谐和宽容的价值观，《中国文化连接》（1987）的研究发现，在构成了儒家集群的中国人价值观中，勤奋排在第二位。

在儒家动力论方面，中国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相反，据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坚持“短期定位”，这意味着不仅非洲人没有展现出儒家的活力特征，而且他们更倾向于：展示（民族或族裔）的自豪感，不愿承认他们需要向他人学习；呼吁民间智慧和传统，而不是科学证据；他们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命运、运气和环境，而不是努力或缺乏努力。或者说，霍夫斯泰德（Hofstede）和他的团队总结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重点是非洲价值观调查也出现了类似结果。本次非洲价值观调查涵盖了撒哈拉以南各个非洲国家，并通过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本土观点来获取信息。

此外，非洲学者已经注意到，和谐或社群主义与班图精神相关的方式开始倾向于阻碍儒家动力论中的元素。

相比为了长期积累资本而节俭生活，传统非洲人更倾向于将和谐或社群关系解释为希望或至少鼓励他们在短期内消费，特别是用于大家庭和社会。工作和成功的关键不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财富本身（沃伦·巴菲特），而是要与其他人分享，包括非核心家庭成员。

应该清楚的是，儒家几乎不会把自我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相反，对于他们来说，和谐即意味着要调和自己的欲望，调节自己的利益满足，以便能够帮助他人。

然而，儒家和中国人通常更倾向于与自己的家庭保持和睦，并经常考虑到生意，尤其是储蓄和投资，作为为后代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生意交易不再严格依据书面协议文字的趋势。西方人倾向于根据对合同的书面解读来解决争端，但中国人并不倾向于这样做。相反，后者经常呼吁和谐关系，双方通过创造性协同确定彼此之间应该发生什么，从而互惠互利。如果发生不可预见的库存短缺，中国的经理人会比美国人更愿意重新谈判合同条款。

这种方法有时总结为“人治”（即贤德之人），与“法治”相对应。对于那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来说，负责人因为接受过培训并且具备智慧而处于优越地位，应该对其加以利用，以促进互利关系。书面协议是一种渴望进入或形成和谐关系的象征，以便公司领导人可以根据必要修改其内容以达到期望的目的。

“人治”思想对于中国的经商方式有着额外的影响，即通过知名度的“关系”战略。即中国人寻求建立、维持和丰富的和谐关系或“网络”。虽然关系存在于学校、组织、俱乐部等，但是在经济背景下的讨论最为广泛，因为商人都想发展非正式的互助关系。尽管关系纽带已经超出了家庭范围，但作为儒家思想的反映，它们属于家庭式，因为它们意味着长久可靠，不易被打破。简而言之，关系成员是一个人“组内”的一部分。使用这些连接取得成功是当代中国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西方人通常认为这是腐败现象，因为存在偏袒，缺乏用于分配资源的正式程序。

虽然撒哈拉以南地区与来自相似种族和语言背景的人有业务往来，但是并不存在特殊关系网影响中国业务的情况存在。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偏见和关系因素对非洲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例如，传统的非洲社会习惯于回报，并在对方给予好处时表示感谢。结果，一些非洲企业领导人向那些帮助过他们生意的人赠礼，有时甚至给政府官员送礼，这种做法被西方人定义为腐败。此外，“家庭第一”的定位并不经常被用来作为裙带关系的理由。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谐问题继续影响企业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时间的考虑方式。任何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或熟悉该地区的人都知道“非洲时间”。尽管这有时被认为是一种贬义词，并且不应被用作条条框框，但它代表一种真实的现象，即撒哈拉以南地区认为守时不如参与交易中所涉及的关系重要，和谐即表示给予他人更多的关注。如果一个人正在与某人谈话，并且所需时间超出计划，

那么许多非洲人仍然会继续谈话，即使最终导致其他会面迟到。正如一位非洲学者所说的那样，“时间首先与社会义务相关，其次才是专业度”。

此外，传统撒哈拉以南社会的时间流动尚未在任何接近其资本主义的程度上进行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公司的产出最大化和投入最小化，个人倾向完全被忽视。例如，期待社会化成为非洲前殖民时期小憩片刻的充足理由。此外，非洲人倾向于基于共识的决策意味着撒哈拉以南的工人希望在进行管理时能够进行实质性的咨询，这点也是非洲商业伦理学家经常推荐的做法，但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寻找适合各方的前进方向。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和谐理念认为，下级遵守上级指示，以最适合集体的方式进行指导，更容易与有关守时、效率和工作场所等级制度的资本主义规范保持连贯一致。

3. 社会

与欧美相比，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中国社会互动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思考自身关系的方式。关系不仅告诉我们，在非洲或是中国，一个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也透露了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在西方国家，人们习惯于通过自我的内在品质对自身进行定义，比如具体的爱好或价值观以及在特定场合不会因对方是谁而发生改变的品性。相反，在前文论述的两种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个体更趋向于通过外在品质定义自我。他们认为自己是谁时，经常会考虑存在关系或正在与之建立关系的对方是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了能够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人们需要确定自身的角色，比如某个族系中的成员、教师、教会成员等；而在给定时刻，他们认为自己是谁通常与他们正在担任的角色存在对应关系。在这一点上，曾有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学者说道，“东方人认为一个人在与不同人打交道时，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现在让我们回到更为严格的评估思考，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中国社会互动的另一个显著相似点在于二者对于和谐关系的强调的产物为对待家庭的方式。在当代西方国家，鲜有人将结婚生子视为道德义务。婚姻和孩子是打造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对于欧美人或者至少对于西方道德哲学家与职业伦理学家而言，他们很少认为一个人选择单身或丁克属于违背职责，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惭愧或羞耻。相反，对和谐的反复关注，特别是家庭生活中，已经表明非洲和中国受本土价值观影响的人群开始认为选择不婚和不生儿育女延续香火属于错误行为，而当代理论学者受其鼓舞，开始认为这种判据有理有据。对于两种传统文化而言，

家庭是和谐关系的最重要的表达，凌驾于一个人一生中应追求的所有理想之上。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思考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中国的社会关系差异，以及在不同的和谐观念之下，如何做到纷纷效仿。虽然中非人民都认为在决定如何分配个人金钱、精力、时间和其他资源时，从道德层次出发，家庭应排在第一位，但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本土价值观的讨论中则更为显著。曾有学者说道，“在非洲社会中，人们热情好客，这点在其价值观中占较大比重”和“热情好客是非洲人民的主要价值观之一，从未曾忘却”。在前殖民时代，陌生人进入村庄后，往往体会到的是热情和慷慨，家庭成员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款待来客。并且几乎所有的当代非洲人认为热情好客是班图精神的精髓所在。

相反，这种定位“从传统的儒家观点来看难以证明”。非洲人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有尊严，并坚持共融（同时也倾向于认为共融的实际关系最为重要），但中国人基本上不会抱有这样的思想。对陌生人的欢迎并不是中国社会文献中的一个显要主题，如果有的话，人们会发现，在被纳入他们的关系之前，中国人经常对“外来人群”保持警惕。

最后，非洲和中国社会之间另一个有趣的差异在于沟通的本质以及沟通如何受对和谐的不同理解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参阅一篇由奥古斯丁·萧特（Augustine Shutte）在第一本专门讨论班图精神的伦理书中进行的研究。他注意到一项在修道院里对两组修女进行的调查。这项研究发现，在完成必做的杂务和祷告后，德国的修女们经常通过编织或缝纫继续工作，而非洲的修女则是将时间用在了聊天。研究指出，每个修女群体都认为另一个群体道德缺失；德国人认为非洲人不够勤奋，而非洲人则反对认为德国人更关心实际问题而不是关心人。此外，在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对撒哈拉以南文化的分析中，他注意到西方人发现奇怪的是，非洲人倾向于为了对话而对话，而非达成任何结论或实现目标。

一般来说，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培养和谐（理解为身份和团结）关系的注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关系上，不惜代价，只为完成任务。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则是交际或情感行为在战略或工具行动上占有更大的位置，至少与西方相比，非洲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前者视为和谐关系的一个实例。尽管学者们对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目标达成经常因对和谐的注重而被迫缓和，但似乎中国人倾向于少说话，认为沉默是金，西方人和非洲人则恰好相反。粗暴地说，非洲人似乎试图通过谈话来促进和谐，而中国人则是通过不说话来避免冲突。

三 结论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分析非洲和中国的本土主要价值观，并提出以下事实：和谐是一种概念，统一了两种传统中对和谐的深刻思考，突出了二者和谐观念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以合理的方式提出这些相关概念如何继续影响当代思想和行为。具体地说，笔者关注的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班图精神和中国儒学的伦理观，认为和谐关系的某些概念——简言之，前者的身份和团结以及后者的等级差异的互惠——在这两种道德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并且这些传统的和谐理念解释了近期非洲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方面的重要相似性和差异性。

在本文中，笔者发现二者在历史、地理空间和多样性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笔者通过考察二者如何影响某些当代信仰和实践，对两个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概念进行了比较。如果本研究旨在发现中国和非洲，甚至与之相关的西方国家的某些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可以从和谐的不同表达，与团结或自治相比和谐是否更适合成为基本道德价值观，以及中国或非洲（或其他国家）对和谐的概念定义是否基于系统哲学等角度出发，来进一步扩充方法和途径。